

桑榆晚情

□ 见习记者 杨玉梅 文/图

沧海一粟

# 了不起的夕阳红



李子川(左一)在教老人们唱歌。

在涧西区长安路6号社区,人们常会听到一阵阵歌声,这歌声有些沧桑,却又充满激情。原来,这是“夕阳红歌唱班”在练唱。歌唱班的老师叫李子川,今年已经69岁。她唱起歌声声洪亮,教起课来耐心细致,凡被她教过的学生,无不对她感激称赞。

## 为唱歌辞去工作

长安路6号社区的歌唱班已组建好几年了。李子川记得,那是2003年,社区负责人看到年轻人都出去工作了,只剩下老年人留在家中,显得很孤单。为了让老人们有个玩的地方,丰富大家的晚年生活,社区决定成立歌唱班,让老人们闲了就来唱唱歌,还能锻炼身体。

歌唱班成立了,没有老师也不行,这时候,很多人都想到了李子川。李子川从小喜

欢唱歌、跳舞,在学校、单位和社区的文艺演出中经常表演独唱。社区负责人找到她,说:“你是咱社区的人,这个歌唱班的老师就由你来当。”当时,李子川虽已退休,但还出去打了好几份工。当了歌唱班的老师后,她为了专心把课上好,把所有的工作都辞了。

“起步的时候挺难的。”李子川说,“很多人都是‘大白嗓子’,没有设备,也没有经费,除了热情,什么都没有。”不过,大家不会唱不要紧,她就一句一句地教,先是教发音方法,后来还教乐理知识;没有设备,她就自己出钱买了黑板、电子琴、手风琴和录音机。就这样,来唱歌的老年人越来越多。李子川一直坚持“以歌会友”,因此歌唱班上没有老师和学生之分,气氛非常融洽。

## 为排练瘦了6公斤

李子川唱歌并非科班出身,可她教出的那些学生,其专业程度可不亚于科班毕业生。今年,一拖集团搞一个大型庆典活动,交给李子川一项任务:排练一个100人的大合唱。这100人都上了年纪,其中不少人还没唱过歌,更没登上过舞台,这个任务的难度太大了。

不过,难度再大也要上。从夏天开始,李子川每天早上都到牡丹公园教大家唱歌,每天教两个小时。她对大家要求很严格:每个字的发音都要字正腔圆,谁发音不标准,就一个字一个字地纠正;谁迟到或者有事了,一定要请假;每个人都要唱给她听,以逐个纠正发音。那段时间,李子川也很累,她的衣服整天都在汗水中泡着。就这样,大家整整排练了4个月。

演出的时候,本来他们是作为一支业余队前去助兴的,没想到唱得那么好,主办方破例给他们颁发了一个“特别奖”。

为了排练这次节目,李子川整整瘦了6公斤。

## 自己创作《牡丹颂》

李子川不仅教大家唱歌,自己也创作了不少歌曲。

一直以来,她都有个想法:每年到了牡丹花会,我们都请明星来唱歌,但明星很少唱牡丹。作为洛阳人,我们应该歌唱牡丹,创作一首自己的牡丹之歌。因此,2005年,几经易稿,她创作出了一首《牡丹颂》,还配了舞蹈。没想到机缘巧合,这首歌竟被中央电视台《与您相约》栏目收录,还得到了中央电视台知名导演的赞扬,李子川她们别提多高兴了。现在,这首歌已被人们广为传唱。

从那时起,她一发不可收,接连创作出《老人十大劝》、《好久没到洛阳来》、《铁军》等20多首歌曲。其中很多歌曲一经她们演唱,就受到了很多人的喜爱。

闲话茶馆

# 做个爱笑的老人

□ 长河

人一旦上了年纪,耳边总能听到一些坏消息,比如哪个朋友住院了,哪个熟人去世了。这真让我不得不得想到一个词儿:生老病死。生和死之间竟然有两个最让人感觉又无奈又无奈的词——“老”和“病”,老病、老病,人一老,病也就跟着来了。

不过,真是这样吗?其实,老人就像老树,老树虽有黄叶不时飘落,却仍挺拔地活在天地间;老人只要乐观健康,在65岁到95岁中,仍有30年逍遥快乐的日子。要紧的是,老人要找到自己的生活乐趣,所谓“游于艺”是也!

在“艺术”的天地里嬉戏,或欣赏,或创作,就会其乐无穷。只要老人有自己想做的事,加上生活经验的体悟和读书所得的智慧,从理论上讲,一个老人不应该成天在家里自寻烦恼,而应是大度乐观,心无遗憾——我诗意地活过,经历过悲欢离合,作为大地的过客,还有什么不满意?

作为老人,有一些辛苦赚来的钱,就可以过自己喜欢的生活,不必每天上班下班,现在的生活真正属于自己。我可以到外面游山玩水,当然也可以和老朋友聚聚,谈古论今。

我看过很多电影和书,这让我充实,助

我成长。我也爱喝咖啡,每当心情不好,一杯咖啡总能让我精神放松,甚至能消除暂时的头痛。当然,还有茶,想喝什么,选择权在我。人生还不够美好吗?那就吃一颗糖吧,嘴巴里是甜的,心里也是甜的,人生所有的苦,都可以暂时忘记了。

在“生老病死”之间,人生还有许多美好的事物,所以我们不要一直在“悲苦”上面兜圈子。

做个爱笑的老人吧!当忧伤来袭,就抬头看看窗外挺拔的老树,老人一样可以活出好风景!

# 专家对话“脑病贴补工程”

脑病贴补工程在全国启动以来,受到众多患者的追捧,几个月来我们收到许多热心患者的建议:除了药品贴补这一惠民政策外,是否能有权威的脑病专家给予面对面的答疑释惑?我们的回答是:“国际健康产业研究院脑健康研究中心——全国脑病贴补工程专家组”早已筹备完成,随时准备为患者服务。

这次莅临洛阳的是“脑病贴补工程专家组”核心成员刘主任。刘主任从医50多年,一直潜心研究脑病的成因与治疗方法,在国内外发表了多篇权威论文,走在治疗脑病的科技最前沿。记者了解到,刘主任加入“脑病贴补专家组”的原因只有两个:第一,GM1作为治疗脑病的物质很早就已被发现,但其提取浓度的技术壁

垒一直是世界难题,“生璠素”的GM1含量从以往传统产品的5%左右提高到92%,这么高的浓度,治疗效果比同类产品要好得多;第二,如此好的产品还为患者着想,给予贴补,作为一名老医务工作者,他认为加入“脑病贴补专家组”是很有必要的。

详情咨询:(0379)63319920

# 1960年的两块压岁钱

□ 王森

我父亲是一名普普通通的铁路工人。我从记事起,就知道家里很穷,日子过得很清苦。每到月底,母亲总是东家借碗米,西家借点钱,用来维持全家的生活,等月初父亲发了工资,再一一还上。

那时,父亲每月只有60多元的工资,根本应付不了6口之家的开销。直到上学前,我都没有奢望过年会得到压岁钱。我知道,不是父亲小气,实在是家里的钱不够花。人们常说,小孩最盼过年,这话一点儿都不假。可一到过年,看到左邻右舍的小朋友一个个穿着新衣服,手里拿着压岁钱到处神气地“显摆”,我心里总是酸溜溜的。有几次,我都跑到了父母跟前,却仍没敢开口要压岁钱。

1960年,我在铁路部门一个职工子弟学校读一年级,也就是这年春节,我终于有了压岁钱。那是农历大年三十的晚上,父亲拉过我的手,说:“过年了,你又大了一岁,应该学会怎样花钱了。”他从衣袋里拿出了10张贰角纸币,放在我的手上:“这是给你的,记住了,别乱花。”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,父亲给我压岁钱了,还是崭新的!当确定这两元钱真是属于我的时,我心里一阵激动,高兴得简直要跳起来。

我把这10张贰角纸币整好,放在文具盒的最底层。身上有了钱,心里总是美滋滋的。开学时,老师说要交1.5元学杂费,我从文具盒里拿出8张贰角纸币,第一个交给了老师。回家后,我告诉父亲已用他给的压岁钱交了学杂费,父亲高兴得连声夸我懂事。剩下的5角钱,我仍然放在文具盒里,每天都要看上几眼,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满足与自信。

一年时间很快过去了,我给父母捧回了一张“三好学生”奖状。暑假过后,我升到了二年级。一天,在放学途中,两名同学追着玩,有个叫小六的同学摔了个跟头,膝盖流血了,我和同学们把他扶到当时的劳保卫生所包扎伤口,需要交药费0.48元。当时其他同学身上都没带钱,我就从文具盒里拿出了自己的最后5角钱。直到小六的妈妈来我家表示感谢时,我父母才知道这件事,都说我是好孩子。

父亲给的压岁钱,我大多都用来交了学杂费,从不乱花。即使学校开运动会,我也不舍得买两分钱一根的冰棍来吃。因为我知道,父亲给我的每一分钱都来之不易,凝结着许多心血和汗水。自从有了压岁钱,我感到自己长大了不少,不但多了一份满足与自信,更多了一份成熟与责任。压岁钱带给我这么多的益处,是父亲当初没有想到的。如今,每到过年给儿子压岁钱时,我心里仍会涌起一股暖流……

